

乾隆一生写诗忆孝贤

乾隆皇帝与孝贤皇后感情深厚，相敬如宾。可惜的是，他与孝贤皇后携手走过二十一年，皇后便早早离世。从清代《高宗纯皇帝实录》以及乾隆皇帝的御制诗集中可以看到，在孝贤皇后去世后，乾隆皇帝对她非常怀念。五十年间，他亲临皇后陵寝祭奠百余次，为她写下了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诗。

嫡子早夭

雍正五年(1727年)，16岁的四阿哥弘历与小半岁的富察氏奉旨成婚。

乾隆十一年(1746年)到乾隆十三年(1748年)，不到三年的时光里，乾隆帝经历了他这一生中的大喜大悲。这一年四月初八浴佛节的子时，乾隆皇帝迎来了第二位嫡子。自乾隆三年(1738年)嫡长子永璉去世后，他一直期待皇后能够再为他诞下一位皇子。在欣喜之余，他写下了一首诗：

九龙喷水梵函传，疑似今思信有焉。已看黍田沾沃若，更欣椒壁庆居然。人情静验咸和豫，天意钦承倍惕乾。额手但知丰是瑞，颀祈岁岁结为缘。(《浴佛日复雨因题》)

乾隆帝生怕后人看不懂这层意思，特意在“更欣椒壁庆居然”那里做了注：“是日中宫有弄璋之喜”，即皇后生了男孩。

九月一日，皇帝为孩子起名为永琮。琮是重要仪式上的一种重要的礼器，琮字也代表着孩子承续宗庙。不过第二天在瀛台阅览王公们所进呈的感恩诗时，乾隆竟然发现他的十六叔——庄亲王允禄的孙子也叫永琮。这位永琮当时已经十岁，乾隆帝愣是给人家改名为永璋，并要求“查外间

所起名字，与内廷所收字样重复者共有几人。现在俱毋庸另改，即将折内字样注销”，即宗室内如果有与外廷中的名字重复的，不必再改名，只需将重复的字删除即可，“外间起名，不得复用内廷拟定字样”。

乾隆十二年，在永琮一周岁之际，按照前一年写就的诗，皇帝续写一首，以表达自己的喜悦。然而这一切美好被接下来的厄运击得粉碎。这年的除夕，乾隆皇帝照例在保和殿宴请蒙古各部王公。典礼结束后，他得到了永琮病危的消息。永琮最终没有敌过天花病毒，在当天离开了人世，年仅一岁半。

皇后在东巡路上去世

随着永琮的离去，孝贤皇后的身体每况愈下。新年，皇后强忍着丧子之痛，参加贯穿整个正月的皇家庆典活动，紧接着，二月初四，皇帝便开始了早已计划好的东巡。有些史料笔记的说法是永琮去世后，皇后梦到了泰山的碧霞元君在召唤她，于是她也参加了这次东巡。

三月初，皇帝与皇后一行抵达济南。三月八日，皇帝和皇后踏上归途，十一日在德州登船。没想到，这一天，孝贤皇后因病去世。

十七日，皇后梓宫抵达北京，奉安紫禁城内的长春宫。二十一日乾隆帝到长春宫祭奠皇后，并写下了《大行皇后挽诗》。

自雍正五年(1727年)七月十八日两人成婚，到乾隆十三年(1748年)皇后去世，两个人携手走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。皇后唯一留下的血脉，就是和敬公主，乾隆帝不禁想到已经故去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(皇长女)，往事历历在目，令他黯然神伤。

次日，皇帝再到长春宫祭奠皇后，并将皇后的谥号拟为“孝贤”。这也是皇后在生前向皇帝表达的意思。

二十五日，皇后梓宫奉移景山观德殿，他再次写下了一首诗以示哀悼。他感慨道，二十年的感情就如流水一般一去不复返，如果早知道痛失爱子的同时还会连累孩子的母亲，自己为什么非要偏执于“嫡子”这个想法呢？

不久，乾隆皇帝在梦里和孝贤皇后团聚了，醒来之后他写下了《梦》。

乾隆长达五十年的思念

自孝贤皇后梓宫奉移观德殿后六个月的时间内，乾隆帝一共到观德殿祭奠皇后六十余次。

乾隆十三年浴佛节到来，前一年母子皆在身旁的快乐早已经无影无踪。乾隆在这一天写下了“都来两岁光阴耳，恰似一番梦幻然”之句。四月十七日，皇七子永琮的金棺由曹八里屯运往东陵附近的端慧皇太子(即永璉)园寝安葬，乾隆也来到观德殿祭奠皇后。

从御制诗来看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乾隆皇帝都沉浸在对皇后的怀念中不能自拔，睹物思人，他常常联想起往日和孝贤皇后共同度过的岁月。

这年的七夕，他写诗感慨，天上的牛郎织女每年还会有相会的一天，可是那一天对于自己来说，却永远成了奢望。七月十八日，本该是他和孝贤皇后成婚二十二周年的纪念日，他写下“廿年成梦境，一夕恨川涯”之句，自此他甚至不愿意别人提“结发”两个字，因为失去了举案齐眉的知音(嗟我失齐眉)。

十月七日，皇后梓宫奉移皇城外的静安庄(今三元桥附近)。此后，他多次腾出时间亲自前往祭奠。据《清实录》中的记载，在四年半的时间内，他去静安庄的次数达四十余次，其中有几次，早晨还在京西畅春园向皇太后请安，接着便快马加鞭来到静安庄祭奠，下午再返回圆明园。

乾隆十七年(1752年)十月二十二日，他亲自护送皇后梓宫到东陵皇后的陵寝(即日后他的裕陵)安葬。从第二年起，乾隆在每年的三月十三日都会派遣官员到陵寝祭祀。

不仅每年的三月十三日，其余如每年的清明节、中元节、寒衣节、冬至节和除夕前一两天，乾隆皇帝也会派遣官员到皇后陵和端慧皇太子园寝(葬有永璉、永琮)祭祀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，乾隆帝南巡归途路过泰山，他再次来到当年一起和孝贤来过的碧霞元君祠，写下了“谁能石上三生认”的诗句。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，年过半百的乾隆帝在皇后生日这天

来到孝贤皇后陵。

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，六十岁的乾隆，在孝贤皇后的生日这天来到她的陵寝，在祭奠过后写下了“六旬我独庆，百世汝称贤”的诗句。

十年后，七十岁的乾隆结束了第五次南巡，回到承德避暑山庄会见了六世班禅大师，并在山庄度过了自己七十岁的生日。九月初七，他来到孝贤皇后的陵寝祭祀，写下“曾孙毕姻近，眼者可闻知”，向已故的皇后告知了他们的曾孙将在近期完婚的喜讯，也在感慨这一切泉下的皇后是否有知。

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开年，乾隆帝在《元旦试笔》中写下“昔日漫教思老伴，开年且喜得元孙”诗句。

乾隆六十年(1795年)，八十五岁的皇帝来到孝贤皇后陵，写下了“齐年率归室，乔寿有何欢”之句——本应与你并肩偕老共享天年，如今独活高寿又有何欢颜可言？

转年的嘉庆元年(1796年)三月初九，乾隆再一次来到孝贤皇后的陵寝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。彼时，他和孝贤皇后阴阳分隔近半个世纪，这次他写下了纪念皇后的绝唱：

吉地临旋踵，种松茂入云。暮春中浣忆，四十八年分。携叩新皇帝，酌觞太上君。母应以子贵，名正顺言欣。

与皇后分别已经四十八年了，当年种下的松树现在已经高耸入云了。如今带着新即位的皇帝一起前来，自己也成为太上皇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古代被送去当质子的王子命运如何

车马辚辚的古代官道上，总有些特殊的队伍往来，他们虽护送着王亲贵胄，目的地却是异国牢笼。“质子”，一边是尊贵的身份，一边是未知的忐忑，是古代王朝政权间的棋子，有时也会是文明碰撞时意外的纽带。

从周郑互质到长安质子村

质子制度的根，扎在古人用人立信的老规矩里。古代政权维持同盟关系，最实在的办法就是押人——把对方的核心人物攥在手里，谁也不敢轻易翻脸。

最早把这套玩明白的是东周初年的周郑交质。郑庄公跟周平王因为权力争得面红耳赤，表面上又得维持君臣和睦，最后想出个折中办法：周王的儿子狐去郑国当质子，郑庄公的儿子忽去周都当质子。从此，质子制度逐渐确立下来。

春秋战国，礼崩乐坏，质子交换成了诸侯国间的日常操作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里记载，各国互派质子不下几十次——秦跟赵换，齐跟燕换，楚跟魏换，谁也别想占便宜。这时的质子讲究平等交换，你派太子来，我也得派太子去，本质就是互相抵押的政治保险：把对方的继承人攥在手里，背盟前先掂量掂量自家孩子的命。

汉朝时，匈奴、南越、西域国家等周边政权常派遣质子前往长安，其中最早向汉朝遣质的西域国家是楼兰。元封三年(前108年)，楼兰不得遣一子质匈奴，一子质汉。

唐朝的质子交换规模与频率

均远超前代。这些质子肩负双重使命：一方面代表母国维系关系，另一方面参与大唐外交接待、军事戍卫等工作。成为质子需满足明确标准：其一，必须具备王室或贵族血统，如于阗质子尉迟胜；其二，需德才兼备，质子言行代表母国形象；其三，以未成年或刚成年贵族为宜，便于适应异国环境，减少本国势力牵绊。

有人靠质子救国，有人靠质子夺天下

质子制度看着是担保，实际早成了各国博弈的暗器。一场围绕质子的较量，往往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。

公元前265年，秦国攻打赵国，赵国形势危急，遂向齐国求救。齐国提出条件：需让赵惠文王的弟弟长安君前来充当质子。赵太后起初坚决反对，大臣触龙以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计深远”进谏，赵太后醒悟后同意遣质，齐国随即出兵援赵，《战国策·赵策四》详细记载了这一“以质救国”的典故。

秦能统一六国，质子帮了大忙。一方面，秦国靠收各国质子牵制对方，另一方面，又利用质子分化各国势力。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

的父亲异人。异人是秦国派去赵国的质子，卫国人吕不韦看出了机会，觉得异人是奇货可居，于是在秦国打通关系，让异人认太子妃当母亲；在赵国打点官员，确保异人的安全。最后不光让异人逃回秦国，还帮他当上了秦王。

质子的待遇始终是两国关系的“晴雨表”。比如，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失败后，正在秦国充当质子的丹之子就被秦王处死；王莽新政期间，因匈奴多次犯边，王莽“会诸蛮夷，斩杀咸子登于长安”，《汉书·匈奴传》明确记载了两起质子遇害事件。

意外的“文明摆渡人”

本为政治工具的古代理子，也会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。这些人既主动学习对方的先进文化与技术，又将本国的文化习俗传播开来，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，也悄然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

据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载，秦国质子在赵国期间，系统接触了儒家《诗》《书》典籍与礼乐文化，而赵国质子入秦后，则深入了解法家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的理念，以及秦国领先的耕战技术。杨爱民在《春秋战国质子制度考论》中指出，这种通过质子实现的文化流动，为秦国吸收六国文明成果提供了直接渠道，成为其日后统一六国的重要文化基础——秦国既保留了自身耕战体系的优势，又借鉴了儒家的伦理秩序与赵国的军事战术，实现了制度与文化的融合升级。

质子不仅是文化的学习者，更是本国文化的传播者，为中原注入了新鲜的异域元素。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记载，西域质子传入的胡旋舞、柘枝舞，因“旋转如风”“刚劲明快”等特点，成为唐朝宫廷与民间的流行舞蹈；高丽质子带来的高丽乐，被纳入唐朝十部乐之中，成为宫廷祭祀、宴饮的重要演奏曲目。突厥质子在习儒家经典的同时，将草原游牧文化融入创作，《全唐诗》中收录的突厥质子诗作，多以大漠、孤烟为意象，拓展了唐诗的题材范围。

有人逆袭翻盘，有人客死他乡

质子顶着王室贵族的光环，却难逃沦为政治筹码的宿命，既是维系两国关系的希望，也可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，其悲欢离合与生死沉浮，被多部正史与文献清晰记载。

公元前257年，秦军围攻邯郸，赵王大怒之下欲诛杀质子异人泄愤。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详细记载了这一危机时刻：吕不韦紧急筹措“金六百斤予守者吏”，买通守城官员，协助异人乔装成商人，连夜逃离邯郸，才侥幸捡回一命。而异人的妻子赵姬与年幼的儿子嬴政，未能一同出逃，被留在赵国当作人质，直至公元前249年异人登上秦王之位后，母子二人才被接回秦国。汉朝时期，匈奴质子须卜的遭遇则令人唏嘘。王莽新政期间，汉匈关系急剧恶化，本已归附汉朝

的须卜当与妻子须卜居次，被王莽强行扣留长安作为质子，最终病死，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，其事见于《汉书·匈奴传》。

质子制度的落幕

宋朝以后，质子制度已渐成摆设，不再是外交的核心手段。黎虎在《汉唐外交制度史》中说，此时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达到了新高度，对藩属国的控制能力显著增强，无需再通过扣押人质这种强制手段来维系宗藩关系。同时，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官僚体系的成熟，为王朝提供了更为温和、有效的外交途径——通过派遣使臣颁诏、传播儒家文化、开展经济往来等方式，便可实现对藩属国的文化与政治影响。据《宋史·外国传》记载，宋与西夏、高丽等政权交往期间，虽偶有质子相关的提议，但均未正式实施，仅以遣使朝贡、互赠礼品等方式维持关系，质子制度的实际作用已大打折扣。

元朝，质子制度近乎名存实亡。蒙古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片土地，建立起横跨亚欧的庞大帝国。对于被征服的地区，元朝主要依靠军事威慑、行政管辖与驿站体系进行控制，根本无需通过质子制度来约束。《元史·外夷传》记载，这一时期主动派遣质子前来的仅为少数偏远小国，且这些质子大多仅承担礼仪性角色，不再具备政治抵押的核心功能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微乎其微。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